

明清江西天主教的传播

吴薇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 江西 南昌 330027)

摘要:明代万历到清代乾隆年间(1583-1775)有近百位耶稣会士进入江西传播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初期,以江西为跳板,通向京城;教难时期,江西成为大多数传教士的避难所,并且在避难期间,江西地区的传教事业也得到拓展,连续开辟了南昌、建昌、赣州和抚州四大教区;乾隆朝实行禁教政策后,江西又成为耶稣会士秘密进入内地重新开教的重地。这些都意味着,鸦片战争以前江西的天主教活动并非一片空白,恰恰相反,有相当长一段历史,其地位不可忽视。

关键词:江西;天主教;耶稣会士;传播;明清时期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3)01-0054-06

Spreading of Catholic in Jiangxi Province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 Wei

(History Departmen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7, China)

Abstract: By investigating nearly a hundred Jesuits in Jiangxi from Wanli period to Qianlong period (1583 - 1775), the author tries to show Jiangxi owns a long history and important position in terms of Catholic activities before the Opium Wa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Jesuits entering China mainland, Jiangxi acted as a transition center on their way to the capital, and sheltered for most of missionaries during the religion persecution time as well. The Catholic developed in Jiangxi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big parishes like Nanchang, Jianchang, Ganzhou and Fuzhou were established consecutively. After the Catholic was prohibited in Qianlong period, Jiangxi became a necessary place to stay when the Jesuits tried to secretly return to inner China to reestablish new regions.

Key words: Jiangxi; Catholic; Jesuits; spread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到清乾隆四十年(1775)近200年间,有近百位耶稣会士涉足江西境域,为天主教在江西的传播奠定深厚根基。耶稣会士在江西的活动在遗存下来的由耶稣会士撰写的中国传教书籍中并不乏见,但在当代人写的关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著作当中,却一直缺乏关注和系统的整理。其实,在以耶稣会士传播为主的明清时期天主教第三次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江西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江西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耶稣会士进入京城不可逾越的地区;几次教难时期,江西又成为京城耶稣会士被驱逐的必经

之地。这一进一出,为江西的天主教传播带来深远的影响。

一、明后期的南昌、建昌开教

1. 利玛窦来华和南昌教区的开辟

江西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是北上的必经之地,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江西成为耶稣会士刚刚进入中国腹地时期重要的活动区域之一。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hien Ricci)是中国内地天主教开教的创始人。^①他在进入南昌之前,已在广州和肇庆传教十二年。1595-1598年,他在南昌定居传教。

①利玛窦于1583年进入中国内地之前,已经有范礼安和罗明坚神父在广州等地试着定居传教,但由于官府的破坏,未能持续很久。

收稿日期:2002-09-19

作者简介:吴薇(1979-),女,江西抚州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江西地方史研究。

比利玛窦早几年进入中国传教的罗明坚神父提出,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总策略应当是:小心行事,不惊动人民,首先取得士大夫的信任,然后打入宫廷。^[1](P26)利氏遵循这一策略,他在南昌的活动主要是结交文人和官员,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利玛窦通过一个名叫王继楼的医生,结识江西巡抚陆万馥,他向陆献上三棱镜,陆同意了利氏在南昌定居的要求。利玛窦还结识了两位南昌的明朝宗室:建安王朱多葦和乐安王朱多煊。1595年,利玛窦写出第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献给建安王。次年,又写完陆巡抚所要的《西国记法》,这是一部论述如何记忆的书。这两部书并不涉及传教,但是它们的刊行,使得南昌的文人士子官绅对利氏刮目相看。而利氏本人的谦逊博学也很快赢得南昌上层社会的赞赏,帮助他在南昌立稳了脚跟。

虽然得到一些上层绅士和宗亲的好感,但利玛窦在南昌的传教并非一帆风顺,“仍然经常与邻居、以及别的人发生冲突和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多。……神父们有时被知识阶层侮辱,有时又受到贵人的虐待……也受到百姓的骚扰,有时甚至受到基督徒本身的骚扰。”^[2](P218)尽管如此,他还是取得一些成绩,例如,他说服了建安王全家入教。随着天主教徒的增多和教徒中地位显赫者的支持,利玛窦在南昌的根基逐渐牢固。1596年,利玛窦在南昌建立了江西第一座也是全国第三座耶稣会士住院。

1598年,利玛窦离开南昌,接替他主持南昌教务的是1595年12月到达南昌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苏如望(Jean Soerio),和他一起到达的是中国修士黄明沙(Francois Martinez)。他们在南昌取得了不错的传教成绩,“第一年劝化一七十岁之老人入教;第二年受洗者有三百人,以后每年如是。新入教之人中有明朝宗亲数人。”^[3](P63)1598年,另一位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罗如望(Jean de Rocha)被派至南昌,与苏如望共同主持南昌教务。1607年苏如望因病卒于南昌(另有一说,于1605年逝世于澳门)。

1596年,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李玛诺(Emmanuel Diaz Senior)被派入中国内地,任韶州、南昌、南京3个住院的神父。1606年,李玛诺在中国修士丘良厚(Paeal Mendez)的陪同下,重返南昌传教。入教之人日渐增多。李玛诺曾在南昌为一明室宗亲及其兄弟三人,以及王之老母和婢女、侄女等6人洗礼。^[3](P78-79)

但是,与南京教区的“和平安宁”相比,苏如望和李玛诺主持南昌教务时期,南昌的基督教发展并不顺利,遭遇了许多麻烦,南昌士人曾攻击李玛诺,要把他赶出住所,撵出城去。幸亏当时官员闻得利玛窦在京受宠,出面保护,李才避免被逐。

1608年,南昌修院开办,当时只有修士4人,俱是澳门

籍,辅佐教友3人,皆华人。主院事者为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骆入禄(Jerome Rodriguez),1609年,他因病与李玛诺共还澳门。1610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王丰肃(又名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与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林斐理(Felicien da Silva)前往南京途中,曾在南昌居住四个月。

2. 南京教案爆发和建昌教区的开辟

万历十四年(1616),天主教在明朝传教史上第一次大教案——南京教案爆发。礼部侍郎沈惟三三次上疏,指斥传教士为“狡夷”,传教活动是“浸淫人心”,应当“立限驱逐”。12月18日,万历皇帝颁谕,将在北京的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和南京的王丰肃、谢务禄(后改名曾德昭)一同押解出境。在这次教难中,被抓捕的教会人士共有34人,其中有中国教徒24人。^①但在韶州、南雄和南昌等地的传教士均未受到这场风波的影响,^[4](P32)他们在中国教徒的掩护下隐蔽起来。

教案发生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受到一定限制。传教士们建立互助团体,让信仰虔诚的教徒去访问和安抚其他人,神父们则定期去给他们做忏悔和行圣礼,但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久。

罗如望借丘良厚避难至建昌(今江西南城),和另外两名神甫藏身于一位教民的房子。此后就在建昌传教:

神父们一到那里,就受到所有基督徒慈爱般的接待,被安置在靠近城墙的一所房屋,他们称之为书院(House of Studies),有一套寓所,包括四间寝室及供他们专用的厨房,还有一间相当大的可作为礼拜堂使用的厅堂,开始的时候,到这里来的只有主人全家,全是基督徒。后来,他们的异教亲属和最熟的友人,也去访问,并有一个或两个信了教,他们又引进别的人。所以这个基督教会一点点发展,两年后我到那里去时,他们在圣日作弥撒,有乐器伴奏,集合了相当多的基督徒。……现在已有一处良好的驻地,及众多受到充分教导的基督徒。^[2](P271-272)

建昌是南京教案之后,耶稣会士在全国建立的新驻地之一。此外,葡萄牙传教士费奇规(Gaspard Ferreira)亦曾在建昌建筑教堂一所。费奇规原在韶州传教,因遭到当地儒生、僧人及城中多数居民反对,于1612年乘舟至梅岭脚下的南雄县城,在此赁屋而居,设立礼拜堂一所。南京教案发生后,南雄官吏命其出境,于是出走。大约1630年在建昌建教堂一所。大约到1646年才到广州传教。^②与他在一起的是中国修士石宏基(Francois deLagea)。

3. 曾德昭在南昌和南昌教务的复兴

曾德昭(Alvaro Smedo),又名谢务禄,葡萄牙人,1613年到达南京,开始传教并研习中国语文。1616年发生南京教

① 据《南宮署牒》载:南京教案逮捕的教民,有不少江西人。

②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记载道:“奇规为慎重计即出走。自是以后,奇规事迹吾人不甚详悉。柏应理神甫谓其曾赴江西建昌建筑教堂一所。此事曾经一六三〇年目录证明,一六三四至一六三五年间,奇规尚在建昌。……杜宁-茨博特神甫《中国历史》(一六四九年部分)明言其一六四六年后与毕方济(Sambiasi)同在广州。”(P82-83)可以肯定的是,1634-1635年间,费奇规在建昌。

案,他和王丰肃同时被捕,遣返澳门。1620年重入内地,改名曾德昭,在中国布道和开辟新教区。

南京教案的影响一直延续了六七年,直到对天主教友好的叶向高做了宰相。沈懋于1621年被革职隐退,三年后死去。大约1628-1629年,教案风波渐息,神父们被允许重新回到他们原来的驻所。被破坏的旧房屋得到修缮,并修建了几座新教堂。江西(南昌)也在最繁华的街道修建了一座新教堂和房屋。这段时间曾德昭居住在南昌,他曾讲到另外一座城市的一名基督徒来邀请他前往该城,他在那里受到一名官员告发,最后却在该城长官的保护下得到了房屋的事。^[2](P288-290)

这一时期,天主教已经以南昌为中心,开始向外辐射传播。虽然天主教在南昌得到官府的支持,但是,在省城以外的其它城市,地方官员对于天主教及其传播却不甚明了,仍然把它当作一个异类,并对它感到深深的恐惧,竭力想排斥、驱赶它。天主教在这一时期的传播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过程,不仅是它的传教对象是从官员到百姓,他的传播路途也是从朝廷到各省,再到各县。

1630年是教案平息后教务最繁荣的一年,这一年谢贵禄(Tranquille Grassaetti)、努纳爵(Ignace Nuñez)、方德望(Etienne Faber, Le Fèvre)、杜本笃(Benoit de Mattos)、金弥格(Michel Trigault)、孟儒望(Jean Monteiao)、梅高(Joseph - EtiEnne d' Almeida)等人先后来到江西或途经江西。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贵禄,以南昌为主要驻所,赴各地传教,居江西终其身。1644年,清兵攻陷南昌,他与孟儒望、梅高遇盗匪,同时被害,其墓在南昌。

南京教案平息后,1633年,在江西召开一次重要会议,由当时任中国视察员的葡萄牙耶稣会士班安德(André Palmeiro)主持。这次会议肯定了利玛窦的传教方针,将1627年嘉定会议上讨论的中国礼仪、上帝或天主名称等问题重加讨论,并希望各国传教士能和睦团结。^[3](P202)此前,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于1610年任中国会督,在传教观念与方法上与其前任利玛窦完全背道而驰,从而引起耶稣会内部产生分歧,导致后来引发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

从第一位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到南京教案平息后在南昌振兴教务的曾德昭,三十年来,通过耶稣会士的努力,天主教终于在江西扎下根基,究其原因,是在朝廷与洋教尚未正式接触之前,辛勤而精明的耶稣会士就已经利用各种手段打通层层关节,赢得了高级地方官员和上层绅士的支持,朝廷接见利玛窦之前,他已经把基督教义传播了好几个地方,南昌也成为他的根据地之一。继利玛窦之后,南昌教务得到很好的保持和推广,尽管仍不时遭到一些百姓和士绅的攻击,

教务发展仍然很快。“南京教难”爆发,包括江西在内的各地教会被禁止,传教士被逮捕、驱逐,教徒被抓,基督教受到一次打击,但并不惨重;传教活动受到限制,但并没有断绝。传教士和教徒以顽强坚韧的精神生存下来,神父们避开中心城市,转而向边区小城市发展教务,罗如望和费奇规利用这个时机在建昌开教,加强江西的天主教基础。教案平息后,教士又恢复了正常的传教活动。

二、明清之际的江西耶稣会士

1662-1665年间,钦天监官杨光先后写了《不得已》和《辟邪论》两文人奏,攻击汤若望,指斥天主教为邪教,爆发了著名的“历法大狱”。此时康熙刚刚继位,尚未成年。直到1669年康熙除鳌拜亲政,清朝廷才又重新开始奉行优待传教士的政策,为“历法大狱”全面平反。康熙帝还在1692年3月22日发表教令,准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天主教也取得很大发展。江西开辟了赣州、饶州、抚州、九江四个教区。

1. 赣州教区的建立

利玛窦北上途中,他因翻船而在赣州逗留过一段时间,此为赣州有天主教之始。而赣州教区的建立则有赖于七十多年以后的法国传教士刘迪我(Jacques le Favre),1657年刘迪我与法国传教士洪度贞(Humbert Augery)从澳门赴江西,路遇盗匪,几乎毙命。幸遇许夫人^①相救。到了赣州,他得到巡抚佟国器的资助,修建一座教堂,并在赣州传教:

至赣州,巡抚佟国器待之如友,其友谊历久而不变。国器为建教堂一所,又为购置宽大驻所一处。一六五八年教堂落成,国器亲临,并招群官至,参加开堂典礼。……迪我对于华语尚未熟习,国器乃代之宣教,首言天主教之优良,次励群官保护,并劝彼等入教,复刻一碑记置迪我客室中。

……一六五九年迪我赖佟巡抚之助,修葺建昌教堂住宅,并在距赣州十月程之福建汀州建筑新堂一所。次年又在某地建筑圣母堂一所。一六六二年,得群官助在吉安建筑教堂一所。^[3](P294)

佟国器何许人也?他是“顺治正宫皇后之从弟,康熙外祖佟图赖之侄也。为清清贵戚之臣,前在北京时,已厌闻圣教道理,久为心折,特以多宠之故,未能受洗;……此次国器统兵南下,偏历浙江、福建、江西各省,到处访问神父所在,加意保护;慨捐鉅款,重修福州、赣州、吉安、建昌各圣堂,刊印圣教经书多种,作序弁其首,以广流传。”^[5](P49-54)1657年,佟国器任督察院右副教御史,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巡历赣州时,正好遇上刘迪我。有这样一位大背景的人物作靠山,耶稣会在赣州很快建立起教堂,教务也迅速发展。

1660年法国传教士聂仲迁(Adrien Greslon)入江西任赣

^① 这位许太夫人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她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是著名的中国天主教徒徐光启的孙女,圣名甘第大(Candida)。许许曾也是天主教史上著名人物。据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许母徐太夫人贍恤穷人,供养传教士,又将以前教士送赠其先祖光启的舆图、地球仪、日晷、天文仪器望远镜、自鸣钟、西洋风景等册归还教士,以便在与中国士大夫晋接时,作为馈赠礼物。许太夫人曾随其子许曾宦游江西、四川、河南等省,于是南昌等地教会亦曾得许太夫人赞助。

州教务。福建汀州、江西吉安等处传教所隶之。1664年,官府命令仲迁与瞿笃德、方玛诺离开赣州,后笃德随利玛弟赴广州,方玛诺偕刘迪我往南昌,仲迁则赴吉安,赣州教堂被破坏。

吾人流滴之讯传布(赣州)城中,教内外人来教堂者,为教不可胜计。教内人之来,乃因此恶耗而表示忧郁;教外人或因好奇心之驱使而来,或因唇舌吾草而来,余则乘机窃夺堂中诸物,竟至盗及树木。^[3](P301)

聂仲迁后被捕入狱,满广州,1671年重返江西,居南昌。1695年歿于赣州。法国神甫乐类思(Louis Gobbé)自从澳门进入内地以来,除刚刚开始几个月在福建外,一直到1663年逝世,都在南昌传教。法国传教士穆氏三兄弟(穆尼阁 Nicolas Motel,次弟穆迪我 Jacques Motel,幼弟穆格我 Claude Motel)皆到过江西,但停留时间都不长。穆尼阁于1656年末到南昌,未满三个月即歿;穆迪我于1657年初抵中国,随即被派往江西,到南昌时,教堂皆毁,得许夫人之子许缙曾资助,悉皆修复,并于1660年扩而张之,次年至武昌,^[3](P307)穆格我于1671年逝世于江西赣州。^[6](P317)

教难时期,江西似乎成为传教士们的避难之所。聂伯多(Pierre Cunevari),意大利人,1630年入华,1652年赴江西南昌。到1665年“历法大狱”,禁教之事起,伯多与殷铎泽同被押解赴京。1671年重返南昌,次年歿,葬南昌城外。

利玛弟(Mathias de Maya)1662年仇教事起时,“适在江西赣州”^[3](P290)可知当时赣州教务已建立并发展起来,利玛弟时任副教区长。

2. 传教士与地方官的交锋

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意大利人,始传教于江西。1657年赴中国,1659年到达建昌,1660年在建昌府建住宅一所,并主持建昌以外各城镇传教所七处。殷铎泽与地方官府曾有一次交锋,发生在1665年“历法大狱”之前:

建昌长官某初与铎泽善,继受属吏讪,与教士为仇,诬报于省,谓铎泽为匪首,并以教堂太高,有碍风水,欲拆毁之。虽经人关说与汤若望神甫之致书,教堂仍不免于拆毁,修复者三次,拆毁亦三次。然铎泽藏伏不出,该长官尚未敢逮捕铎泽也。^[3](P327-328)

建昌长官为什么会“初与为善”,到后来态度大变,要“与教士为仇”呢?1662年左右,朝廷就已经有反洋教人士对汤若望不满,并谏皇帝,要求驱除传教士。上述事件虽然没有写明时间,但从接下来的材料可以推断出,这次冲突发生在1662年-1665年间:

地方仇教之事息,闻二月,全国仇教之事继起,一六六五年铎泽与聂伯多同被逮送赴京……^[3](P328)

由此可见,江西的地方官是先听到一些风声之后才开始转变态度的。他们的反教动作走在全国其它教区之前,可见

江西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对基督教信息较为敏感的地方。

可以看出,耶稣会士在江西开辟并发展了第三个传教基地,即赣州教区,由刘迪我和聂仲迁主持。期间利玛弟、穆格我、瞿笃德、方玛诺等均到过赣州,或作短暂停留,万惟一、瞿笃德、方玛诺为聂仲迁助理,或一辈子都在此传教,到第二次全国性仇教事件结束后,赣州的教务已经非常发达。

自1665年至1705年,先后曾有李西满(葡)、穆若瑟(葡)、习安东(葡)、孟由义(葡)、罗斐理(意)、卫方济(比),到过江西传教。其中卫方济走的地方很多,除了到过南昌、建昌和赣州三个驻地之外,他还去过南丰。何大经(葡)、李国正(葡)都曾短暂到过江西。

3. 饶州、抚州和九江教区的开辟

1698年,法国传教士利圣学(Charles de Broissia)与郭中传(Jean Alexis de Gollet)、孟正气(Jean Domenge)同时被派往江西开辟教所,传教抚州、饶州、九江。在饶州和九江二地,他们遭到官吏阻挠一年半,并不顺利。之后,利圣学派傅圣泽、殷弘绪和孟正气三位神甫分别管理这三座城市的教务。

殷弘绪(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法国人,1699年6月24日来华,当年即开教于江西饶州,并传教于景德镇。在他到达饶州以前,这里没有一个信教者,首先入教的是一个为修建教堂的穷泥水匠,当年入教者仅有2人。到了1712年,受洗者已有80人。景德镇的教民中,土人较少,多为工匠。入教者互相救济,或访问患传染病者。殷弘绪在景德镇建大教堂一所,经费大约由教会拨款和自己节衣缩食而筹得。殷弘绪将景德镇的制瓷技术输入欧洲,他曾亲自访问在教匠人,询问制瓷法,并参证中国图籍,写了两封长信寄回欧洲。西方得知景德镇之瓷器,大约要从殷弘绪算起。

此外,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quet),1699年6月24日至华。1702年至江西之南昌、抚州。^①傅圣泽初至抚州,仅有教民百人,一年以后“其数倍增”。孟正气于1700年到达江西九江,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1702年,即到达湖广。

清初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黄金时代,从江西的天主教发展来看,到1700年,江西共有了南昌、建昌、赣州、抚州、饶州、九江六个正式的教区,并有专门的神父主持。法国传教士的地位逐渐取代葡萄牙传教士,成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西班牙多明我会于1631年,意大利方济各会于1633年均重入中土。另外,奥斯定会于168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681年也次第来华。各修会为扩大各自在华势力展开激烈争夺,引发18世纪初的“礼仪之争”。

三、“礼仪之争”中的耶稣会士及其传教: 1705-1720年

康熙、雍正执政时期,也是中国政府对天主教态度发生大转变的时期。围绕华夏礼仪和基督教规的辩论引起的“礼

^① 据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傅圣泽于“1703年到达江西临江府,1709年在南昌、福州府和临江府”。在时间上和费赖之编《书目》相差一年,但是可以肯定,这里的“福州府”为“抚州府”之误。另外,至少可以知道他在江西停留了七年。

仪之争”再次引起清朝全国性的仇教浪潮。大批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教堂教产被剥夺,并且禁止中国人的信教活动。1725年雍正发布禁教令,载入清朝法典《大清律》之中,使禁教由政治性的措施变成固定的法律制度的举措。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天主教徒遭到镇压。

1. 康、雍仇教之前的天主教发展

因“礼仪之争”引起的全国性仇教事件之前,天主教在中国境内仍然顺利发展,各地教会不断发展。

1701年9月至年末,有六位传教士进入江西,^①他们分别是:法国传教士沙守信(Émeric de Chavagnac)于1701年9月14日抵达广州,紧接着被派往江西,此后一直在江西传教。1706年接任殷弘绪所管教区,1717年歿于饶州。从沙守信的传教信札来看,他还曾到过抚州和赣州。戈维里(Pierre de Goville),法国人,1701年9月9日入华,传教江西数年。意大利传教士方纪金(Jerôme Franchi)、顾铎泽(Étienne-Joseph le Couteux)、汤尚贤(Pierre-Vincent de Tartre),三位神甫于1701年末一同赴江西南昌学习语言。1703年方纪金迁至赣州,最初的六个月内,就为1900人接受告解,受洗者110人。^[3](P576)在赣州住了两年后,1705年调往山东。与方纪金同时到达南昌的顾铎泽,仅知其有1703年的南昌信札,内容不详。汤尚贤也是初到广州,停留了几日,就被派往江西,传教数年。法国耶稣会士聂若翰(François-Jean Noël)于1701年9月19日抵华,1702年传教江西。

除了一位是意大利人之外,其余五位都是法国人。他们是1705年仇教风暴刮起之前在江西躬身传教的耶稣会士。他们在江西停留的时间都比较长,最短两年,最长的十六年,对维持旧教区的教务,扩展传教范围作出巨大贡献。

2. 仇教期间的江西耶稣会士

1705年康熙开始禁教,全国再度掀起仇教风暴,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再度遭到打击。这期间,由于资料匮乏,江西的耶稣会士行踪和事迹不详,很难从中窥见这次仇教对江西天主教的影响。但是,据相关文献可以确知,这一时期由于法国和葡萄牙争夺中国教区的保教权,因此到达江西的耶稣会士绝大多数来自于法国和葡萄牙两国。

冯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法兰西人。据殷弘绪记载:1707年冯在此省(江西)曾感受严重仇教事件三次。冯本人曾有一封自九江致科洛尼亚神甫的信札,言台湾、澎湖诸岛事(1715年8月)。因此,至少以上两个时间内,冯秉正是在江西。另外,自1710年,冯秉正偕雷孝思、德玛诺两位神甫测绘河南、江南、浙江、福建、台湾及附近诸岛地图,并借这个机会,常往来各地鼓励教民,传布教理。因此,冯秉正1715年在九江写的那封信也很可能是他在测绘地图时期,经过九江时写的。

利国安(Jean Laurenti),意大利人,1697年抵华,1718年被召至北京,两年后,被任命为中国日本视察员。由于得罪康

熙,被加锁链而入狱。1722年至1725年利国安尚在江西,雍正仇教事起后,谪居广州,1727年歿于澳门。利国安到江西,带有被贬谪的意味。骆保禄(Jean-Paul Gozani),意大利人,1694年抵华,其主要传教区在河南开封、福建福州、兴化等地。他到江西赣州是在1724年因仇教事起,谪居广州之前,隐居于赣州若干月,时年已78岁高龄。

严嘉乐(Charles Slaviczek),波希米亚人,1716年至华,常居北京,因病偶赴南方广州(1721)、九江、南昌(1722-1723)等处,但时常往返于两地之间。1723年8月7日有一封南昌信札,8月25日有一封北京信札,言钦天监官想像行星交会之误;10月14日又有南昌信札,言康熙之崩,雍正嗣位;11月份,又到达北京,此后一直在北京居住,未再回到江西。这几位耶稣会士都是以京城或别的省份为主要传教区,而不是江西。他们在江西时正好都是仇教时期。他们在江西停留的时间不长,或往来于京城与江西两地,或被迫走广州或澳门,于江西的传教事业贡献不大。但是他们都有很高的身份和地位,利国安和严嘉乐是直接面对皇帝的,在仇教之前都受到皇帝的重视和礼遇;骆保禄也被誉为“最初阐明中国犹太教徒之状况第一人”,^[3](P474)后来也被任命为北京会团长,留在京城。因此,这些人物在仇教期间来到江西,说明这时候江西已经从一个传教前沿阵地,转变成为后方的“收容所”。此时在江西传教的还有一位中国籍耶稣会士陈多禄(Pierre Teh'en),苏州人,医师,1734年8月份,派往江西,由于身为医师,因此“得人他人所不能入之家宅,于诊治疾病之余,兼为灵魂之救赎。”^[3](P765)直到1740年可能仍在江西临江府。陈多禄的医生身份为他传教带来极大便利,大概是由于当时迫于形势,不便公开传教的缘故。

“礼仪之争”引起的仇教风暴使耶稣会士在中国开始了近一百年的噩运。这是罗马教廷内部斗争引起的恶果。正如谢和耐所说:“如果利玛窦对于中国的风俗和习惯所采纳的宽容态度从这位伟大的传教士逝世起未在教友中引起反响,如果上述做法并未最终被教廷否决,那么耶稣会士们的影响就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正是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恶化了18世纪中、欧之间的所有关系。”^[7](P452)康、雍两朝仇教的影响远远大于以往历次仇教所带来的影响。

四、乾、嘉时期的禁教和天主教活动

1773年,教皇达蒙十四世颁布《天主的赎罪》诏令,取缔了耶稣会。两年后,这一诏令在北京宣布,在中国活动的耶稣会被迫宣布解散。1785年,遣使会(Lazarists)接管了耶稣会在中国的牧区。耶稣会的解散和清朝的禁教政策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事业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嘉庆皇帝继续采取闭关和禁教政策,其间对天主教的查禁也连绵不断,规模较大的教会史上的“1805年之迫害”,这一年查处了教士教徒1000多人。但是,在此严重打击下,

^① 据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还有一位聂若望(Noël, Jean)神父,也是法国人,于1701年底进入江西南昌传教。

天主教事业在耶稣会士的努力下,仍然顽强存活着。此时的江西再次由于地利之便,而成为耶稣会士秘密联络的枢纽,和他们秘密进入内地重新开教的重地。

杨德望(Etienne Yang),中国北京人,1751年被派往法国,1759年3月入耶稣会,1764年初毕业,1765年抵中国。两次被派往江西。1787年他在江西被一教民举发,于当年5月初被捕下狱。据载:“杨神甫寓江西吾人之一堂中,是为广州、北京与各省交通集中之所。吾人从京运送物品至广州,仆役等必送至杨甫驻所,是亦为各省运物所抵之处。至此汇齐送到广州。仆役还京时,亦须经过杨神甫驻所。”^[3](P973-974)江西成为连接北京与广州两个天主教重要活动城市的纽带。

对于杨被捕下狱这件事,江西省官员的态度令人寻味:

省(江西)中大吏恐其事上闻于朝,别生枝节,不欲承认其为传教士,而视之为一平常教民,不以此案上闻。详情吾人未悉,仅知德望被送北京,是年十月尚未抵京,恐其殁于中道。^[3](P974)

这则材料告诉我们:其一,耶稣会被遣散后,江西重新又成为耶稣会士的传教重地。一些耶稣会士秘密遣入内地,希望能够重新开教。他们再次把眼光盯住江西这片土地,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江西具有良好的地理优势,交通方便,易于藏身;另一方面则因为江西拥有较为牢固的传教基础和一批数量大而信仰忠诚的教徒。其二,这个时期的地方官员态度比较微妙,他们一方面要继续按照圣旨,逮捕传教士,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把事情闹大,让皇帝知道本省仍有严重的教情。可见,地方官员对待传教士和天主教模糊、暧昧而又自相矛盾的态度使处境艰难的天主教有了很大的容身空间。

绝大部分地区的教会转入了地下活动,其传教范围也从原来的行政中心转移到乡村或城市边缘地带。一部分传教士继续从澳门、广州秘密潜入中国内地,他们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但仍然以耶稣会士为名,进行传教。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密闭教徒村镇。^①

可以肯定的是,虽然遭到全国范围的严厉禁教,天主教在乾嘉年间仍未禁绝,只是转入地下,传教活动一直在进行,否则就难以理解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潮水般涌进中国各地,触角遍及乡村、城镇。

如果没有明朝至清朝前期这个传教过程的铺垫,这样大的规模是难以想象的。

五、结语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乾隆年间,近百位耶稣会士涉足江西。江西作为南北地理上的纽带,在天主教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耶稣会士背负着十字架,无论是由海路从广州登岸,北上进京,还是遭到皇帝贬谪后不得不由京城逃回广州,江西都是其必经之地。加上江西的地方官员对天主教和耶稣会士的态度暧昧不明,在很大程度上使江西的天主教得以存活下来,发展壮大。耶稣会士继创立了第一个教区南昌之后,又在几次教难期间连续创立了建昌、赣州两大教区,并在饶州、抚州和九江开辟教区,教区遍及江西全省。从明清这近百位耶稣会士在江西的活动来看,鸦片战争以前,江西的天主教传播已有相当长一段历史,其地位不可忽视。耶稣会在进入中国初期,以江西为跳板,通向京城;教难时期,江西成为大多数传教士的避难所,并且在避难期间,江西地区的传教事业也得到拓展;乾隆朝实行禁教政策后,江西又成为耶稣会士秘密进入内地重新开教的重地。

参考文献:

- [1] 郭卫东. 中土基督[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 [2] [葡] 曾德昭. 大中国志[M]. 柯高济译, 李中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3] [法] 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上、下册[M]. 冯承钧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4] 江文汉. 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7.
- [5] 方豪. 中国天主教人物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年影印本.
- [6] [法] 荣振华.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M]. 耿昇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7] [法]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M]. 耿昇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戴利朝)

^① 这一观点目前受到挑战。美国密歇根大学阿兰·斯威顿(Alan Sweeten)指出,至少在江西的乡村,教徒并没有和四邻及其他异教徒隔绝,他们仍然在日常事务上和他们正常往来,共同构成社区的一份子。见阿兰·斯威顿:《中国乡村的基督教: 冲突与适应》,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1年。

明清江西天主教的传播

作者: [吴薇](#)
 作者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 江西, 南昌, 330027](#)
 刊名: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3, 36(1)
 被引用次数: 2次

参考文献(7条)

1. 郭卫东. [中土基督](#) 2001
2. 曾德昭, 何高济, 李申. [大中国志](#) 1998
3. 费赖之, 冯承钧.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1995
4. 江文汉. [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 1987
5. 方豪. [中国天主教人物传](#) 1988
6. 荣振华, 耿昇.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1995
7. 谢和耐, 耿昇. [中国社会史](#) 1995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周良沱, 章剑, 刘须群, 董利](#) [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问题需要新思维](#) -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 (6)

天主教非合法组织是我国宗教领域的敏感问题,我们在过去处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正确措施,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但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必须把它放到整个国家的伟大变革和社会的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进行,即法治已替代伦理、宗教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宗教管理已从“意识形态角度”走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宗教本身则将从上层建筑逐步走向“第三部门”.因此,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问题务实的新思维是: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通过法律手段,使其从非合法状态走向合法状态.对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应执行“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策略.在处理中梵关系上,特别是主教任命问题上,中国天主教会应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2. 学位论文 [吴薇](#) [明清时期江西天主教的传播](#) 2003

该文以江西明清地方社会为背景,以天主教传教士、中国天主教徒、绅士文人、官员为主角,对晚明至清末天主教在江西传教的情况进行梳理和归纳,描绘出一幅明清天主教在地方社会活动的场景.

3. 期刊论文 [黄细嘉, 曹雪稚, 利玛竇](#) [“南昌传教模式”初探](#) - [江西社会科学](#) 2007, "" (3)

明末,西方传教士在广东传教遭遇种种失败后,利玛竇等人入驻南昌传教.利玛竇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这意味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不仅是利玛竇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与当时江西深厚的儒学传统文化底蕴和江西文化的一些显著特点密切相关.

4. 期刊论文 [周良沱, 刘须群, 章剑, 董利, ZHOU Liang-Tuo, LIU Xu-Qun, ZHANG Jian, DONG Li](#) [我国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 (5)

我国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形成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天主教领域掀起了“三自”爱国运动,中国绝大多数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脱离罗马教廷控制,但有部分神职人员和信徒受罗马教廷影响转入“地下”活动,成为中国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最早形态.改革开放后,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发展迅速,一度在农村城镇蔓延扩大.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与罗马教廷或明或暗支持密切相关,同时,它的存在有历史客观原因和现实社会基础.

5. 学位论文 [延经革](#) [清初天主教文人许缙曾研究](#) 2009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以宗教为媒介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开启了中、欧两大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在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砥砺的过程中,西方的耶稣会士与中方的文人成为文化交流中的主导力量.学界致力于研究中方文人回应异质文化的学者不乏其人,硕果累累.然对于清初文人许缙曾(1627-?年)的研究却尚显单薄.许缙曾字孝修,号鹤沙,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历官江西驿传道副使、四川布政使司上下川东道参政、河南按察使至云南按察使.缙曾自幼受洗入天主教,一生与天主教结下不解之缘.他生长于天主教世家,受到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其一生宦海沉浮,所到之处建堂宣教,为天主教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娶妻纳妾,敬拜城隍,祈福劝善,屡次违反天主教教规,并著有《太上感应篇》.在他身上,中西文化交融杂糅.

本文通过对许缙曾文集及友人互赠的诗文以及县志中爬梳资料,对其家族背景、交友脉络、信仰世界的详细考查,将其置放于当时的社会思潮下,进一步审视其生活的文化土壤,辨析其思想及信仰.我们看到其将天主教教义附和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理解和融合,在其内心深处构建了自己的信仰世界,以善恶为泾渭分明的界线,以仁德为归旨,以劝谕为目标,来规范自身的行为.他已不复有祖辈“两头蛇”族的矛盾,而是将外来异质文化自然地融合到本土文化之中,在他的身上,更能看出文化碰撞之后,互相融合的的状态.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相对于西方文明的排他性而言,更具有包容并蓄的优势.于是在缙曾一代,文化的融合,以及向本土回归的趋势便生成了一种中西不分,杂糅包的新型文化因子.

6. 期刊论文 [张英明, 徐庆铭, ZHANG Ying-ming, XU Qing-ming](#) [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传教客家原乡汀赣札记](#) - [嘉应学院学报](#) 2006, 24(1)

17世纪,艾儒略、刘迪我、聂仲迁等耶稣会士,先后在客家原乡闽西(汀州)、赣南(赣州)开堂布教,使之发展成为西方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播天主教的重要基地之一,从而为今日客家原乡社会和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

7. 期刊论文 [韩福秋, HAN Fu-qiu](#) [近代早期西欧天主教改革成因浅析——“反宗教改革”再审视](#) -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9(4)

本文对近代早期天主教在权力组织结构、教会神职人员的道德风尚、普通信徒的宗教需求与教会教义之间存在不协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在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的种种变动的新形势下,天主教对自身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历史必然性。

8. 学位论文 [崔维孝 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 2004

本学位论文以“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为题,对以西班牙传教士为主体的方济会在华传教活动进行陈述、分析和研究。虽然方济会是继耶稣会之后入华的第二大天主教修会,但是在其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一直被中国学术界所忽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大陆学者首先拉开了方济会入华传教研究的帷幕,但是由于缺少史料,研究活动受到制约。笔者旨在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弄清方济会在华传教的路线、方法、策略和对象,活动区域和范围,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立场和策略,以及对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影響。1579年至1732年是方济会在华进行传教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1-1579年至1632年,为方济会入华前的酝酿、尝试、失败和放棄的阶段。2-1633年至1670年,为方济会入华传教,開闢中國山東教區之阶段。由于方济会与耶稣会不同的传教路线和策略,利安当神父在“中国礼仪”问题上与耶稣会发生争拗,並因此而成爲跨世紀的“中国礼仪之争”始作俑者之一。3-1671年至1692年,为方济会在华传教迅速发展的阶段,在恢复山东教区之外,西班牙传教士又開闢了廣東、福建和江西教区,確立了他们在华传教的大格局。4-1693年至1722年,为康熙皇帝與羅馬教廷就“中国礼仪”进行論戰之阶段。在这场論戰中,方济会传教士的觀點和立場逐步向耶穌会靠近,並最終與耶穌会爲伍,他們中大部份人遵康熙皇帝之命,領取“印票”繼續留華傳教。5-1723年至1732年,为雍正皇帝全面禁止天主教的阶段。1722年底康熙駕崩,雍正繼成帝位,隨後一場全面禁教運動便陸續在全國展開。以廣州爲總部的方济会在收容和接待被從各地驅逐而來的傳教士同時,依然在廣東或冒險潛入福建、江西和山東繼續傳教。1732年(雍正十年),居在廣州的傳教士全部被驅逐到澳門,西班牙傳教士也被迫離開中國大陸,但他們中的一些人毅然決定留在澳門,繼續他們在華的傳教事業。如果說耶穌会是明清之際在华传教的主力軍,那麼西班牙方济会則是一支不應被忽視的同盟軍,他們的所作所爲使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動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的时期。這種多元化不僅體現在傳教實體數量的增加,亦體現在他們與耶穌会不同的傳教方法、策略、對象等多個方面。正是這種多元化保證了天主教在华傳教事業的持續發展。

9. 期刊论文 [刘芳 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对中国医学的研究 -社会科学论坛2010,“\(6\)](#)

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康熙年间来到中国,死于乾隆年间,跨康、雍、乾三朝,在中国四十多年,传教于江西、北京等地。在中医和保健方面,他介绍了中国传统种的痘。作为植物学家他亦收集了不少中国植物的资料:如佛手、柿子、荔枝、柳树等等。殷弘绪对中国这些文化瑰宝的介绍在18世纪中西方交流的历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0. 期刊论文 [曹青. CAO Qing 西方传教士对康熙朝政的贡献概述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41(3)

康熙时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凭借自身的知识优势,不仅扶持康熙亲政,而且在剿三藩、与俄订约、随行塞外、制作《皇舆全览图》、构建意识形态诸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康熙对传教士的利用固然是服务于清朝的统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引证文献(2条)

1. [梁洪生 英语世界“江西历史研究”的回顾\[期刊论文\]-史林](#) 2008(1)

2. [刘朝晖 明清以来景德镇的瓷业与社会控制\[学位论文\]博士](#) 2005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xsfdxxb-zxshkxb200301012.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1d055c48-86a6-4ceb-a7da-9e4d00818ff1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